

论开放经济下 我国经济内部外部平衡的协调

何 刚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讲都大幅提高。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 我国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矛盾日益显著, 形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两难或多难困境。本文试图对我国所遇到的内外平衡矛盾进行描述,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同时对我国内外平衡的协调谈些看法。

一、开放经济下外部平衡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一般认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 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外部平衡。这些经济目标之间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矛盾, 使一国可能面临着政策上的困境。

在开放度不高的情况下, 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宏观政策的优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还是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而外部平衡常常受到忽视。这是因为在开放度不高的条件下, 经济的外部平衡在宏观经济目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大, 但对于一个有着较高开放度的国家来讲, 经济的对外平衡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国际收支差额很大, 国内经济的平衡就可能受到不利的影 响: 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 过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则可能造成国内经济衰退。汇率作为货币的对外价值和一种特殊的价格, 直接影响到贸易商品的价格, 而且还间接影响到非贸易商品的价格: 因此意义更为重大。剧烈的汇率变动不利于贸易部门的稳定, 阻碍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 而且还会对国内物价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在那些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 汇率上下波动对物价的“棘轮效应”会产生严重通货膨胀压力。同时, 本国货币汇率的高估或低估会导致国内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失衡: 汇率高估压制出口, 国内资源从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 汇率低估使出口过度扩张, 资源从非贸易部门流向贸易部门, 这种资源转移的代价是高昂的, 它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并使宝贵的资源在这种无谓的调整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浪费。而且, 随着一国经济开放的增大, 汇率水平变动的其他经济效应如财富效应、收入分配效应、投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资本流动效应、货币效应等都会得到强化, 这使得汇率变动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全局性的复杂影响。因此, 经济开放度越高, 外部平衡在政策目标中的地位也就越重要。这时宏观调控就不仅需要关注经济的内部平衡, 也要同时注重经济的外部平衡。内外平衡的协调成为宏观政策当局的最终政策目标。

二、内外平衡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

最早提出开放经济下内外平衡矛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米德在其名著《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中, 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平衡矛盾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他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国内萧条及国际收支逆差时, 稳定国民收入的膨胀性政策将使国际收支失衡加剧, 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紧缩性政策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萎缩, 如此政府在选择应当采取何种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时面临着难以回避的难题, 这就是著名的“米德冲突”。“米德冲突”可以视为内外平衡矛盾的一个特例, 我们需要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研究内外平衡矛盾。

一个国家经济内部平衡通常被认为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三项目标。如果认为“奥肯法则”成立, 即假定经济实际增长率与就业水平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并且假定“菲利普斯曲线”短期内也是成立的, 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替换关系, 那么内部平衡实际上就转化为一个, 即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某种组合。

外部平衡目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国际收支平衡与汇率稳定。纯粹从理论上讲, 如果一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 则其对外经济目标就是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如果其实行的是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 其对外经济目标就是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但现实中很难有绝对的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 因此对外平衡目标也就往往是在保持本国汇率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外部平衡目标变成了两个子目标: 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如果我们不考虑自我实现预期导致的货币投机活动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国际收支平衡目标和汇率稳定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即: 如果国际收支实现了平衡, 外汇市场上本国货币汇率就肯定是稳定的; 如果国际收支不平衡, 而且本国中央银行未能做出积极的干预, 外汇市场上本国货币汇率就会发生波动。然而国际收支是由十多个子项目组成的, 国际收支总体实现了平衡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子项目实现了平衡, 而且宏观调控对贸易收支差额和金融项目差额的关注程度显然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假定政府希望在保证本国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贸易收支的平衡, 这样就可以将内外平衡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表述在下表中。

表 1

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关系的表现形式

	内部经济部门	外部经济部门		内外平衡关系
		国际收支情况	本国货币汇率	
1	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低通货膨胀	总体顺差(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入)	升值	无冲突
2	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低通货膨胀	总体逆差(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出)	贬值	冲突小
3	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低通货膨胀	总体顺差(贸易逆差/资本净流入)	升值	冲突大
4	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低通货膨胀	总体逆差(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出)	贬值	冲突大
5	经济过热/失业率下降/高通货膨胀	总体顺差(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入)	升值	冲突大
6	经济过热/失业率下降/高通货膨胀	总体逆差(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出)	贬值	冲突大
7	经济过热/失业率下降/高通货膨胀	总体顺差(贸易逆差/资本净流入)	升值	冲突小
8	经济过热/失业率下降/高通货膨胀	总体逆差(贸易逆差/资本净流出)	贬值	无冲突

注:本表中假设贸易顺差不能完全抵消资本之流出,造成外汇市场供不应求,本币贬值;资本之流入抵消了贸易逆差之后还有余,造成外汇市场供过于求,本币升值。

表 1 中的第三栏至第六栏为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相矛盾的情况,国内总需求的管理面临着两难处境,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类政策困境,然而还可能面临本国货币内外价值相背离的矛盾,即国内经济衰退且通货膨胀率不高,但货币对外贬值(第四栏);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货币国内价值下降,但货币对外升值(第五栏)。第二栏和第七栏从国内经济运行状况同贸易收支来看没有矛盾,但仍然面临内外经济目标的冲突,即本国货币的内外价值发生了背离:第二栏的国内价值稳定而对外贬值;第七栏的国内贬值而对外升值。从该表还可以看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矛盾出现的可能性明显增大,而且矛盾表现也呈多样化趋势。

理论分析导致内外平衡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经济的开放,一国经济体系分为“国内经济部门”和“国外经济部门”两个

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两种经济活动,及国内经济活动和国外经济活动。这两类经济活动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在向各自平衡状态移动时,都需要一些经济变量相应变动的支持。它们所要求的变量变动方向和程度在一些条件下是相同的,但在其他的一些条件下就可能是不同的。当后一种情况发生时,就会造成内外平衡矛盾。概括地说,经济的开放是发生内外平衡矛盾的根本原因,

三、我国经历的内外平衡矛盾

经济的开放是发生内外平衡矛盾的根本原因,我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改革、逐步开放的经济道路,这就从理论逻辑上决定了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提高,我国也必然遭遇内外平衡矛盾日益突出的局面。表 2 是对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内外经济目标状况的对比。

表 2

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内外经济目标状况的对比

	内部经济目标(政策要求)	外部经济目标(政策要求)	内外矛盾
1990	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要求刺激需求,提高增长速度)	国际收支出现顺差	不严重
1991	经济增长速度上升,物价平稳	国际收支保持较大顺差	不严重
1992	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加速,物价回升(要求紧缩性政策)	国际收支逆差严重(要求紧缩性政策)	不严重
1993	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严重(要求紧缩性政策)	国际收支逆差严重(要求紧缩性政策)	不严重
1994	经济增长持续高速度,恶性通货膨胀(要求紧缩性经济政策)	国际收支巨额顺差,人民币市场汇率趋向升值(要求扩张性经济政策)	矛盾严重
1995	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大幅回落但仍然较高(要求继续实行紧缩性政策)	国际收支保持巨额顺差,人民币市场汇率继续升值(要求扩张性经济政策)	矛盾严重
1996	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基本稳定,就业形势严峻(要求适度刺激需求,加快经济增长)	国际收支继续顺差,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要求扩张性经济政策)	不严重
1997—1998	经济回升乏力,物价水平稳定但出现了通货紧缩,失业问题继续恶化(要求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资本流入放慢,贸易收支顺差增长停滞,人民币市场汇率在央行调控下继续保持稳定,但出现了较严重的外汇黑市和非法逃汇、套汇活动(要求较为从紧的经济政策)	矛盾严重

总体来讲,我国内外平衡相互矛盾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尖锐起来的。9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国内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得到了深入推进,内部经济部门和外部经济部门之间的互动性开始表现出来。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平衡矛盾。大致可以将 1994 年后我国经历的内外平衡矛盾分为两个阶段和两种性质。

第一阶段:1994—1995 年间的政策困境。1994—1995 年间我国遭遇的政策困境是一种典型的由于国际收支顺差产生的内外平衡矛盾。内外经济目标面对多重的政策困境:人民币对外价值(人民币市场汇率)和对内价值(国内物价水平)变动相背离:外汇占款持续增长使得国内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努力遇到

困境:对外经济部门的盈余和国内经济的过热相冲突。这是我国的宏观调控遇到的从未有过的困境。

(1)为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稳定物价水平,要求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产生进一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会压制国内需求,恶化就业形势。

(2)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人民币的对外价值应该贬值,但国际收支顺差却使得外汇市场上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考虑到物价因素,人民币实际升值的幅度相当大,对我国贸易部门的经济效应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要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可以放松银根,扩大内需,促进进口,减少贸易顺差,但如此又

威胁到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

第二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的影响。1997年初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对我国的影响在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度的贬值,形成了对中国出口部门沉重的竞争压力。1997年开始,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在多个月份出现了负增长,外资流入增长的速度也放慢了,虽然国际收支整体仍然是顺差,但也缺乏增长的势头。东南亚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收支渠道对我国的影响是:出口增长放慢,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经济效益恶化,国内市场需求不振更加严重,出现了通货紧缩。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对我国的影响是:受危机预期的影响,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的降息举措加剧了资本外逃,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贬值预期。

1997—1998年我国宏观调控面对这样的局面: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都可能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因此货币政策不应该放松;同时这些改革又产生了很严重的失业压力,而且国内市场需求疲软,生产过剩的局面已经形成,为缓解失业压力和刺激经济增长都需要货币政策予以放松。对外经济部门需要人民币适当贬值以改善竞争力,增加国家出口,但一方面人民币对外贬值会在国内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威胁到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又会打击东南亚各国货币,形成新一轮货币金融危机,反过来对中国同样是一种损害。所以我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人民币不贬值,必然承担沉重的代价;人民币对外贬值其后果也不利。

可以预计,随着我国开放不断进行,我国可能会面临更加严重更加频繁的内外平衡矛盾,我们必须对如何协调我国的内外矛盾做出思考。

四、对协调我国内外平衡矛盾的设想

一般认为,进行政策搭配是解决开放经济下内外平衡矛盾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适当设计宏观调控方案,灵活地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并将之合理地搭配来同时实现内外平衡。政策搭配理论最早由詹姆斯·米德提出,后来丁伯根进一步指出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之间的一般性的数量关系,即丁伯根法则。随后,蒙代尔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政策搭配思想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使政策搭配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内外矛盾局面,应用合理的多种政策工具的搭配应当是我国宏观管理当局思索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我国政府应当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条件,对我国各种政策工具的实施基础、传导机制及相互关联做出细致的分析,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工具配合方案,以解决我国所面临的政策困境。

1. 我国所面临的内外平衡矛盾的解决方法是进行政策搭配。这应当是我国对策制定的出发点。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形成了从米德的初始政策搭配思想、丁伯根的政策数量工具模型、有效市场分类法则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的一个完整的有关政策搭配的理论体系,而且这一理论体系仍在继续得到丰富发展。西方这套政策搭配经典理论在我国是否适用,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我国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制度、微观基础、经济结构等方面来考证西万国家政策搭配理论在我国的现实可行性,而且应当进一步研究提出适于我国的政策搭配理论模型。姜波克在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的基础上,提出MF模型中的BP曲线应当为一条折线,而不是

基本MF模型中的直线观点,可看作是对MF模型针对我国制度特性所作的修正,这种分析具有重大意义,目前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以找到适合我国政策搭配的理论基础。

2. 我国目前的宏观政策工具的种类少,政策传导机制单调,使我国的宏观目标调控受到很大制约,应当加快政策工具创新步伐,这将大大增强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多种政策搭配使用之所以能够实现单一政策工具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每种政策工具都有独特的政策传导机制,从而对各种政策目标具有独到的政策效能。从我国的目前情况出发,可以考虑适用外币同业拆借、人民币远期汇率、外汇储备债券及外币流动利息预扣税等工具来丰富我国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创造性地使用新的政策工具,利用新的政策传导机制,将大大增强政府的协调各项政策目标的能力。

3. 随着我国经济情况的变化,对传统的宏观政策体系的改革进行新的评价,对其不适应部分适当改革,增强其在新环境下的政策效能。199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改革规划明确提出将以货币供给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在目前国际短期资本巨额流动和金融工具创新的冲击下,西方国家的货币总量指标与其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相关性越来越差,货币总量指标作为主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暴露出种种问题,很多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纷纷转向利率指标,或直接盯住货币政策的最终指标。虽然我国有严厉的资本管制措施,但自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来,外国资本(其中很可能有较大的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我国,对国内货币政策也产生了冲击。伴随着我国利率改革的发展以及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的深化,利率在我国货币体系中作用越来越突出,利率在货币调控中的地位应得到提高,特别应考虑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重要性,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应成为未来货币政策的新目标。

我国的财政政策目前主要是使用国债政策,也应当注意到财政补贴、贴息、税收等政策在调节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方面有巨大潜力,合理采用这些政策对外部平衡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同时对内部平衡的调整也有较好的效能。我国应当进一步丰富各类财政政策手段的使用,注重不同财政手段的合理搭配。贸易政策也是我国多年来能熟练驾驭的政策手段,其操作的灵活性是其他政策很难比拟的。在外部平衡难以达到时,贸易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后应加强其使用。

参考文献:

1. 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 刘力臻:《论开放经济下一国货币内外价格的背离》,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6)。
3. 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货币调控和政策搭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6)。
4. 熊贤良:《人民币市场汇率及我国经济内外部平衡》,载《管理月刊》,1995(3)。
5. 李心丹、傅浩:《论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及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8(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江 春)